

# 宫廷政变

——帝王发迹史

董书城 编著

中国国际广

20.7

责任编辑：胡杏天

装帧设计：李士英

版式设计：周 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廷政变：帝王发迹史/董书城编著. —北京：中国国  
际广播出版社，1995.10

ISBN 7-5078-1249-9

I. 宫… II. 董… III. 宫廷-政变-中国-研究 IV. 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771 号

**宫 廷 政 变**

—帝王发迹史

董书城 著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久恒科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激光照排

中国环境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32 开本 印张 9.75 208 千字

1996 年 3 月 第 1 版 1996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ISBN 7-5078-1249-9/2·259 定价：13.00 元

## 绪 论

---

本书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笔者试图从史论的结合上来研究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政变之术。政变之术，是统治阶级上层内部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有与其他政治斗争不同的特点。它由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所发动，以夺取最高统治权为目标，采用突然袭击的非常手段，在极短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迅速完成政权的更替。政变的这些特点，使其与一般的社会革命、军事暴动以及人民起义等等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充满着血腥的屠杀，一次次皇袍加身，一顶顶王冠落地，都是政变之术屡屡实施的结果。这种极端诡谲阴险与毒辣的政变之术，使最高当权者感到恐惧，野心者则为之向往，跃跃欲试。

禅位与篡夺。政变之术的实施，最早见于尧、舜、禹的时代。中国古代关于尧、舜、禹的王位更替，先秦人流传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一种认为尧、舜、禹是天生圣人，不以王位为私，不传子而是让位于贤者，此即所谓传贤禅让说；另一种则认为尧、舜、禹与以后皇帝一样，亦将王位视为私有，经过篡夺而取得，并将王位传于子孙。这是篡夺说。其实这两种传说，同样具有史料价值，在尧、舜、禹时代，“禅让”与“篡夺”会同时并存。因为中国历史在尧、舜、禹时代，已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化时期，禅让与篡夺，正是新旧社会因素相互交错的过渡阶段，此时民主选举的旧传统“禅让”制虽然仍在执行，但是，这些酋长都已视其职位为私有，传于子孙。另外一些显贵，则利用氏族民主选举的传统，作为进行夺权的借口。一旦夺权成功，他又要效法他的前任，将职位传于子孙。每经一次反复、斗争，传统的氏族民主选举制，即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父子相传之世袭制，即在此反复斗争中，逐步产生与加强。随着王位世袭继承制的确立，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为争夺王位继承权便展开激烈的斗争。从夏启开始，这种斗争从未间断，只不过或明或暗，或缓或激，卷进斗争的人数多寡不同而已。君主专制就是适应这种政变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

《史记》记载，夏朝是父死子继制，因系传说时代，史料缺少，难以确定。殷商的王位世系已在甲骨文中得到证实。殷商的王位继承是以兄终弟及制为主。总的看来，弟及多于子继。而分开看，商代前期与中期基本上是兄终弟及制。商王实行兄终弟及制的后果不好，由此不断发生诸子争位的斗争。《史记·殷本纪》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

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如果只由“嫡子”继承，法定继承人仅只一人，觊觎者少，一旦扩大到弟，弟不止一人。再说弟既可传己子，又可传兄长之子，继承者扩大无数倍，争乱必不可免，所以必然引出“九世乱”。

西周实行传子传嫡制，只有极少情形下是兄终弟及的。实行传子传嫡制度，在统治阶级内部起到求定息争的作用。除厉王暴虐，幽王荒淫无道，废妻立妾，废嫡立庶引起动乱外，一般说来是平稳的。但这种制度的致命弱点是：分封制渐渐形成许多国中之国，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祸乱由此而生。同时立嗣的主宰权在君王手里，君王常常忘记历史教训，任意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因而有的以宠求嫡，争宠求立，插手立君的各派势力，明争暗斗，酿成王室宫廷政变。这类宫廷政变，西周各侯国时有出现。进入春秋时期，由奴隶社会渐入封建社会，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加剧，强凌弱，众暴寡，大量小国被吞并。周武王千八百国，春秋见于经传者百四十余国，又并为12诸侯，政治动乱的频繁可以想见。而主要的诸侯国，又反复发生弑君事件，其次数之多，令人瞠目，在春秋时期，就有60多起。在242年里发生如此之多弑君、逐君、执君等政变事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禅代。用弑君的方式以攫取政权，是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违背的，因而容易失去人心。因此历史发展到汉代，政变方式发生一大变化。野心家在改朝换代斗争中，采用“禅代”方式篡位。西汉末年，王莽即用“禅代”以篡汉位。此后，篡位者每以“禅让”以文其奸。三国时曹丕，晋代司马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开国君主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北朝高齐、宇文周，隋代杨坚，唐代李渊，五代后

梁朱温，均仿效“禅让”之方式以谋取帝位。禅让既是“让”，接受者必须力辞，经过三推三让，充分显示让位者之“恳切”，接受者之“谦恭”，后者方可应命。曹丕在其举行接受禅让仪式后，对大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话中的“潜台词”是极为丰富的。

“禅代”往往伴随着一场屠杀，此局自刘裕开端，延续至南北朝以及五代。在此之前，各代“禅代”未有发生暗杀旧主事件。曹丕代汉，封献帝为山阳公，未尝加害。司马炎代魏，封帝奂为陈留王，亦未尝加害。司马伦废惠帝，犹号为太上皇，居之于金铺城。桓元废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寻阳，又劫至江陵，亦未尝加害。自刘裕篡大位，即杀故君，以后齐、梁、陈、隋、北齐、后周，亦无不皆然，此又一大变局。

五代政权的嬗变。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方式又有变化。如将每次皇帝的更换，均作为一次政权递嬗，则五代政权之递嬗，大致有五种方式。一是父子传授。后唐明宗传子从厚，后晋高祖传子重贵，后汉高祖传侄承祐，后周太祖传养子柴荣，世宗柴荣传子宗训，皆属此种方式。二是血战夺权。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以此种方式篡权。三是借兵以自立。后晋高祖石敬瑭即借契丹自立。四是乘乱崛起。后汉高祖刘知远即是乘乱而起家者。五是以禁军夺权。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即是以禁军夺权者。

上述五种方式的政权递嬗中，第一种系属封建社会的正常方式，但在五代中这个非常时期，由此种方式而产生的政权，除周世宗柴荣以外，均不稳而且短命。第二种方式血战夺权，是唐末藩镇混战的结果及余波，也是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的正常方式。这是由唐朝向五代过渡时必然会出现的结

果。第三、第四种方式，可说是以方镇夺权者，但都并非单纯依靠方镇力量，而与少数民族的进入中原有关，殆有特殊性。第五种方式最值得注意，这种方式产生的政权，多数较为稳定，可以说，在五代时期纷乱中，此种方式有其典型意义。

废立。封建时代，阴谋之臣觊觎皇位，除了上述诸种方式以外，还通过“废立”以控制中央大权。这是宫廷政变方式又一演变。两汉以来，中央政权往往操之于外戚、宦官之手。如西汉之霍氏与王氏，东汉之梁氏，皆为外戚掌握，权重一时，一门几侯，高官厚禄，专横跋扈，左右朝廷。西汉终于亡于外戚之手，他们的斗争手段，就是凭借“废立”，即乘老王晏驾之机，扶立幼主，坐朝问政，独揽大权。稍不如意，随手废去，另立幼主。其废立之方式，一是外戚专权，擅自废立。自战国秦昭襄王宣太后用事，到清末慈禧太后专权，后妃参政以及外戚专权同封建宗法专制相始终。外戚政治的起落与王朝的兴衰成反比。后妃参政及外戚政治之烈者，即为后妃与外戚专权。后妃与外戚专权的结果，使封建王朝遭受巨大损害，轻则政治混乱，由盛而衰，重则国祚倾移，改朝换代，天下遭难。

前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勾结；后世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诛。外戚政治与宦官政治相互倾轧，相互交结，相互补充，并为天下之大害。宦官政治与外戚政治一样，之所以能成其害，追其祸源，皆缘起皇帝的后宫妻妾制度与皇帝制度。汉承秦制，以宦官为中常侍，武帝时，奏请机事，常以宦者主持。至元帝时则宏恭、石显已窃权干政，萧望之、周堪俱被其害。光武中兴，悉用宦官，不复重用士流。和帝践祚幼弱，窦宪兄弟专权，隔绝内外，群臣无由得见，乃独与

宦官郑注定谋收宪，宦官有权自此始。两汉宦官之祸甚烈，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代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所以唐朝宦官之祸甚于外戚，如晚唐八帝除最后昭帝为节度使朱全忠所立外，其余七帝皆为宦官所立，即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而宪宗、敬宗二帝且为宦官所杀。文宗利用外廷官僚，谋诛宦官仇士良没有成功，反被宦官囚禁。后来，唐僖宗甚至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可见皇帝完全变成宦官的工具，宦官凭借皇帝废立来达到夺权的目的。

王室内争。封建社会最为典型的宫廷政变，乃是王室内部的夺嫡立储之争。王室内乱式的政变，在中国古代史中，发生的次数最多，其时间亦最长。上起商、周，下迄明、清，自始至终未有绝迹。在中国历史上，王室内乱式的政变，著名的则有沙丘之变、玄武门之变、夺门之变等。自奴隶制时代开始，实行君位嫡长子继承制，封建时代始终沿用未变。这种制度确立了君位继承的合法原则，但在实施中却面临各种复杂情况。一是部分有识之士主张传位“立贤不以长”与“立长不以贤”观念之间的对立。两种观念的争论，往往造成封建王朝的动荡，诱发宫廷政变。二是在位君主妻妾众多，亲疏喜怒有别，宠姬爱子自然有继位希望，但受到其他“龙子龙孙”们的嫉恨。三是专权君主贪恋权柄，“君老而晚置太子”，储君名分未能尽早确定，亦易引起贪权者非分之想。四是诸皇子周围，各有一批权贵近臣，他们为了自身富贵，不断怂恿诸皇子夺位。在野心家的鼓动下，诸皇子动继位之念，于是皇子之间勾心斗角，宫廷政变一触即发，所以王室内乱的发生，有其必然性。

从上述政变方式的演变史，可以概括出中国古代政变的

类型有三种。一是王室内乱式的政变，新主取代旧主，王朝与君主的血统世系未变。二是改朝换代式的政变，新朝取代旧朝，建立新的君主血统世系。三是社会革命式的政变。不论王朝名号与君主血统世系是否改变，但新主即位，即标志新社会之诞生与新历史之开端。前两种类型，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而后一种类型，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

## 二

政权觊觎者不论采用何种政变方式，都要运用各种具体的政变手段，以实现其篡位的目的。中国古代政变所采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前代的政变手段，易被后代所仿效。新的政变事件，又不断地创造出了新的手段。有效、迅速、隐秘、安全、表面合法化与道德化，能为社会舆论与民众心理所接受，这些都是决定采用何种手段时必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的历次政变中，常用的手段有如下几种。

暗杀。在隐秘的状态下，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政敌，从而实现政权的转移。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政变手段。暗杀的目标，首先是在位君主。当拥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或在继位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者急于黄袍加身而迫不及待时，谋害便成了迅即实现即位的有效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政变频仍，谋杀成风。自刘裕篡晋弑主之后，南北朝以及五代，皆竞相仿效，对旧主都先废后杀，弑君之风炽烈。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司马德文，即皇帝位，后又毒死司马德文；升明三年四月，萧道成废刘准，即皇帝位，五月杀刘准；中兴二年三月，萧衍迫和帝让位，四月即位，尽诛明帝之后；太平元年十月，陈霸先迫梁敬帝禅位，旋又杀害敬帝；太平八年五月，高洋篡夺萧善见王位，次年十二月，使人毒杀善见；北魏永熙三

年七月，宇文泰毒死北魏孝武帝，控制朝政；恭帝三年十二月，宇文觉夺恭帝位，次年又杀恭帝；大定元年，杨坚篡夺北周宇文闾王位，旋又杀之。南北朝政权更替的史实，说明了新主即位之日，即为旧主被杀之时，概不能免。至于其它朝代亦不断出现宫廷政变，多数废立皆以诛杀而结局，其祸惨烈。例如唐中宗皇后韦氏野心勃勃，为了早日临朝，不惜杀害丈夫中宗。隋代杨广利用阴谋手段得立为太子，为抢班夺权，乘其父杨坚病危之际，派遣亲信张衡入宫“拉杀”，“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杨广遂登大位。

假造符谶。符命与图谶均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不同的是，符命有种种征兆，图谶则类似谜语，二者均被视为上天意向与手段。因而谁身膺符命或图谶，谁无疑具有天命的凭证，具有谋取帝位的资格。王莽代汉时，武功县长得一块白石，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字，王莽即以此向汉室索取帝位。魏王曹丕要废黜汉献帝自立时，大臣许芝上书引用《春秋王版谶》中“代赤者魏公子”及《易运期谶》中“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等谶语，以示曹丕称帝上应天命。夺权者为使人相信符命与谶语，还编造帝王受命均有符命，比如，“昔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舜、禹有天下，凤皇翔，洛出《书》；汤之王，白鸟为符；文王为西伯，赤鸟衔丹书；武王伐纣，白鱼升舟；高祖始起，白蛇为征。”等等。天命是取得帝位的有力依据，帝位觊觎者频频假造符命、图谶，以迷惑天下耳目，乘机夺取王位。

借人成事。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借人成事”之策略，即利用甲之力量打倒乙，再从甲手里夺取政权。“借人成事”乃篡权之一种过渡方法。在夺权斗争中，之所以采用“借人成事”，而不直接进行夺权，一是由于力量不足，必须

暂时借用他人力量；二是直接夺权舆论压力太大，必须借用他人进行过渡。如善于玩弄此阴谋发动宫廷政变，则费力小而成功率高。因为此法含有战略诡计，亦为现代阴谋所喜用，其手段多种多样。一是挟诈。使用讹诈与恫吓手段，从被利用者手中夺取权力。战国时代，蔡公弃疾先推翻楚灵王，拥立子干为王，然后又恐吓子干，说楚灵王兵至，使其畏罪自杀，从中转手，夺取楚国王位。二曰借功。即借用敌人力量，将政权直接移置在手。越王勾践借用太宰嚭灭掉吴国，郑子突借用傅瑕夺取子仪之位，即此类政变。所谓借用者，即取权之后，翻脸不认人，杀掉被借用者，如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即杀太宰嚭，郑子突复位数日即处置傅瑕。三曰过渡。先立傀儡政权占据王位，然后等待时机，再行篡逆，实行过渡。石虎为了篡夺石勒王位，待石勒死后，先逼石弘即位，待其势力强大之后，即撕下假面具，逼石弘让位。四曰推出替罪羊。高级掌权者夺位之争，往往险恶异常，一旦失败，谋划者即有生命危险。在此情况下，推出“替罪羊”实为良方。唐代末年，唐昭宗为朱温挟持失去实权，被迫迁都洛阳。当时李茂贞、李克用联兵讨伐朱温。朱温率兵迎战，怕后方有变，乃派李振至洛阳，与蒋玄晖、氏叔琮及朱友恭等设计杀害唐昭宗。政变发生后，朱温假装正经，奔回洛阳，横加罪名，将蒋玄晖等人杀掉。阴谋家推出替罪羊，是玩弄花招，为了保护自己。此种策略性手段，只要情势许可，帝王多有采用。

军事兵变。兵变不同于谋杀，兵变带有凶残性，而谋杀带有冒险性。兵变是在合法的借口下，公开运用军事手段，逼官弑君，实现政权的更替。而谋杀则施用骗局，诱敌于圈套之中，加以暗杀。兵变是公开的军事行动，无法掩人耳目，如果没有合法外衣，则“名不正言不顺”，容易失去号召力，得

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中国古代兵变借用的“外衣”不外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驱除伪主，匡扶社稷。”此种手法，通过否认在位君主的帝系血统，否认现存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使兵变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认可。西汉初年，吕后“驾崩”不久，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等人发动兵变，诛灭诸吕，“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诸吕之变遂告结束。二是“请除奸臣，以清君侧。”这种手段，在兵变初，常以讨伐奸臣为旗帜，避免将矛头指向君主，使兵变师出有名，“义正词严”，以减轻舆论阻力。但兵变发动者的剑锋所指，实乃君主身下宝座，而非君侧之“奸臣”。在其真正目的尚未达到之时，即使“奸臣”已除，君侧已清，兵变仍然不会就此罢休。如西汉吴楚七国联兵，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侯景起兵反梁，托言清除中领军朱异为借口；安禄山反唐，以诛奸臣杨国忠为名；史思明反唐，以向李光弼复仇为名；明朝朱棣发动兵变，夺取侄子朱炆王位，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明代高煦叛乱，以除掉夏原吉等“奸佞之臣”为借口。这种找借口的策略，多为历代叛乱谋反的野心家所袭用。三是“天命转移，皇祚有归”。此时，兵变发动者羽翼已成，无须借用“清君侧”之类的手段，而可直接了当宣布旧王朝气数已尽，新君主理应登基。后周晚期，赵匡胤掌握禁军统率大权，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更迭，基本上都是经兵变得以实现的。四是浑水摸鱼、委恶于人。兵变发动者有意造成一种混乱局势，其则以平息变乱的面目出现，趁火打劫，乱中取胜。南朝宋文帝欲废太子刘邵，刘邵闻讯抢先发动兵变，杀死正文帝亲信徐湛之、江湛等人，并倒打一耙，说徐、江弑逆无状，故杀之。兵变受害者反被诬为兵变的发

动者，而兵变真正策划者，则摇身一变，却成为兵变的平息者。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专权狠毒，为剪除政敌，她与楚王司马玮合谋，使惠帝下诏诛杀辅政大臣司马亮等人。政敌既除，贾后又以“伪造诏书，杀戮大臣”的罪名处死司马玮。

伪造遗诏。在封建社会，君主意志具有最高法律效用。君主的诏命，可以决定储君的废立。即使“驾崩”的君主，其临终遗诏，对于君位的传授，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君位争夺者之命令，系于一纸“遗诏”。生死攸关，诱使阴谋家在“遗诏”问题上，通过篡改或伪造等手段大做手脚。伪造或篡改遗诏的直接目的，在于利用先帝的名义，指定符合己愿的君位继承人。秦始皇于巡行途中，随行的赵高、胡亥、李斯等人，篡改始皇临终遗诏，胡亥即皇帝位，杀太子扶苏，即为一例。唐代韦后毒死丈夫中宗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并“谋遗诏”，立幼帝，韦后自“临朝摄政”。这也是伪造遗诏的实例。

### 三

政变之术与其他斗争手段有不同，这就是：政变的目标在于夺取皇位，参与政变者都是皇族成员、天子近臣与天子权臣；从政变时机来说，它具有突发性；从政变性质来说，它具有冒险性；从政变的迷惘性来说，它具有诡秘性；从政变前的韬晦之术来说，它具有欺诈性；就政变行为来说，它具有决断性；从政变的手段来说，它具有突袭性。所以在政变的运行过程中，它必须十分隐蔽、谨慎与果断，稍有疏忽，即遭杀身灭族之祸。

政变的目的性与参与者。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政权分配的宫廷政变是经常发生的。君臣相斫，父子相戮，乃至夫妇相夺，可谓不绝于史。而伴随这部血腥历史的，则是无穷无尽

的阴谋，究其原因，都是为争夺封建王朝最高的统治权。纵观中国历史：汤伐夏桀，武王诛纣，五霸对立，七国争雄，诸如此类社会革命，无不为帝王宝座而作殊死斗争。其他如连绵不断的起义，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均为帝王之业而厮杀不休。至于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诸如春秋时期的弑君，西汉王莽的篡汉，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五代政权的嬗变，外戚宦官的废立，王室内部的争位，更是风云突变，斩伐不止，这一运动始终指向帝王宝座。

政变之术既然是以夺取皇位为目标，那么参与政变者必须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主要成员。一是皇族成员。他们同旧君主有着共同的血统关系，自以为有资格问鼎大宝。二是天子近臣。这部分人主要是由外戚、宦官及君主的亲信心腹所构成，他们觊觎大位，以攫取中央大权。三是朝廷权臣。这部分人既包括执掌实权的朝臣，也包括手握重兵的悍将。他们通过政变，攫取权力，实行篡逆。以上参与政变的三类人员，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

政变的突发性。政变一般具有突发性的特点。这种突发性，往往发生在以下几种场合：一是君主临终，诸皇子争位。最典型史例就是秦始皇死时所发生的“沙丘之变”，吕后死后所发生的刘氏集团的政变，武则天临终之时所发生的“五王政变”，皆属于此种突发性的宫廷政变。二是新君未稳，权臣擅自废立。这种时刻为政变发动者提供极好的时机。例如西汉昌邑王刘贺即位 27 天即被霍光废去，唐殇帝即位 14 天，即为唐玄宗废去。三是皇帝暴行激成突发性政变。南北朝时，前废帝刘子业与废帝刘昱都是好杀成性，由于自己的种种暴行而激起祸乱身遭杀害，这种政变带有偶然性与突发性的特点。

四是意图早泄，诱发政变，在中国古代史上就有记载，“孙林父因歌逐献公。”楚成王为长子商臣所弑，皆因其过早泄密而被逐被杀。五是形势所逼，铤而走险。如西汉武帝时，太子刘据被江充诬陷谋反，因惧祸矫诏杀江充。魏时高贵乡公曹髦屡受司马昭挟制，不胜其愤，乃率童仆数百人攻司马昭。均因当时形势所迫，骤然发动政变，铤而走险。但结果，他们均因寡不敌众，身遭杀害。总之，突发性政变往往发生于在位君主临终之际，或即位新君尚未稳固之时。参与政变者，为改变既定的继承人，多立新君。由于事态的发展难以准确把握，政变随着机会突然降临而骤然爆发。

政变的冒险性。在封建社会，弑君篡位乃大逆不道之事，历代封建法律将弑君之罪无不列为极刑之首。杀身灭族之酷刑，不能不使政变发动者望而生畏，不寒而栗，不到万不得已或利令智昏，一般决不轻易发动。政变发动者往往感到大祸临头，不发动政变必遭杀身灭族之祸时，才密谋策划，铤而走险发动政变，以挽当时的危局。当然有些政变发动者，志在必夺，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是为了篡夺皇位，改朝换代，并非防卫或避免杀身灭族之祸。此类政变发动者多属于政治阴谋家、野心家之类。但不论政变发动者是属于防卫或属于篡夺，一旦政变开始策划并实施，发动者必将生死置之度外，破釜沉舟，志在必得，这就造成政变之术具有冒险性的特点。前面说过，西汉霍光身为辅佐大臣，重权在握，废黜一个即位不久之昌邑王刘贺，都深感惧怕，每当霍光回忆当年政变情况时，“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史实证明：政变发动者一旦失败，所受惩罚是极其严酷的。秦始皇假父嫪毐因与太后私通，为始皇侦知，因为惧祸，猝然发动政变。但失败之后，身遭极刑，车裂而死，嫪毐死党皆枭首示众，其

余与嫪毐有瓜葛而被“夺爵迁蜀”者达4000余户。这是你死我活的搏斗。政变失败而遭屠杀之惨祸莫如东汉末年的宦官。东汉宦官张让与段珪发动政变屠杀何进大臣。袁绍、袁术率兵报复，攻打宫殿，火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凡是宦官，格杀勿论，以致误杀不少无辜者，计杀2000余人。张让与段珪自知难逃，亦全部投河而死。政变之所以不同于战争，就是因它的成功或失败均有严重的后果，所以政变发动者必须具有冒险精神，孤注一掷，不成功便失败，不杀人便被杀，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有第三种下场。政变之术的风险性即体现在这里。

政变的诡秘性。政变极其诡秘，非参与者不得与知。如此既可保证政变的顺利进行，又可对政变进行道德上的掩饰。政变之术由于过于卑鄙，为人们道德所不齿。即使政变成功之后，参与者也会闭口缄言，对其手段秘而不宣。史传：宋太祖与其弟赵光义夜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或避席，有不可胜状，禁漏三更，太祖以斧玩雪，是夕太祖已死。根据上述史实，有的说是赵光义谋害宋太祖，有的说是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症，属于正常病逝。是耶？非耶？“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又如：太平天国内讫的真相，也是使人迷惑不解。长期以来，在一些太平天国史著中，说法不一，有的说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由盛而衰，关键在于天京内讫，而天京内讫则是由杨秀清“逼封万岁”引起的。但是，“逼封万岁”究竟有无其事，却一直是个问题。布列治门与麦高文撰文发表在《华北先驱周报》上，说天京的内乱的起因是有人向洪秀全告密，而不是“逼封”。洪秀全对杨秀清产生猜忌，遂指使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及部下两万多人。太平天国的内讫究竟由“逼封”引起的？还是由告密引起的？史料互

有矛盾，后世史学家无法弄清真相，这就是政变的诡秘性。

政变的欺诈性。政变之前，为了更好地稳住敌人，麻痹敌人，必须使用韬晦之术，对敌人进行欺骗。要以韬晦逃避敌人的注意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表面上要装疯卖傻，碌碌无为，以掩盖其内心的政治抱负。周文王即采用此韬晦之术。比如，他对纣王表示恭驯，事事照办，句句服从，俯首听命，频频进奉，以此麻痹纣王。姜太公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佯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一韬晦的核心就是：以屈求伸，以退图进，以韬晦之术解除纣王的戒备之心，待时机一到，作关键性的一击，灭掉商朝。司马懿诛曹爽之前，假痴装癫，在政敌面前，假装年老多病，神志不清，颠三倒四，无能为力，而暗中调兵遣将，布置兵力，猝然发动，诛灭曹爽集团。袁世凯是近代之巨奸，屈伸之术更为高明。他被载沣赶下台后，回乡养病。为了蒙蔽清政府耳目，他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待武昌炮声一响，这位闲云野鹤忽然活跃起来，在英美公使敦促下，清政府重新起用他，指挥前方各军，镇压革命军，后来终于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登上大总统宝座。

政变的决断性。政变之术与果断精神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政变发动者只有勇敢决断的精神，而缺乏谋略与能力，那就容易陷入鲁莽与愚笨，他的行为就会经常遭到失败。另一方面，政变发动者虽有谋略胸怀，如缺乏勇敢决断的气质，在政变的千钧一发之际，迟疑不决，再好的政变之术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遭到杀身之祸。隋朝末年，天下纷争，唐高祖李渊决定起兵太原，夺取隋朝天下。但李渊顾虑太多，犹豫不决。谋士刘文静、裴寂劝李渊当机立断，即刻发动兵变，以推翻隋王朝。李世民也向李渊建议，主上无道，百姓